〔读史札记〕

清代北京内外城社会生活习俗之异

李　　乔

通常说：旧时北京城“内九”、“外七”，风俗大同小异。“内九”指内城，“外七”指外城，内外城以前三门为界。对于内外城的社会生活习俗，人们多注意其“同”的一面，“异”的一面则研究不够。考察内外城社会生活习俗之异，必须先说明内外城居民的不同。清朝定都北京以后，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即内城由王公贵族、旗人和少数“有赐第或值廷枢”的汉族显宦居住，而原来在内城居住的汉人则不论官民，一律迁居外城。这样，外城就成了一个汉人为主的，包括官僚士绅、百工商贾、医卜倡优、佣夫走卒等各阶层生活的区域。据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五载，旗人因内城拥挤，也有迁往外城者。但这在外城居民中，实为少数。这一旗民分城居住制度造成的京城居民分布状况，对内外城不同社会生活习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说内城。内城社会生活习俗具有浓厚的贵族气息和旗俗色彩。内外城的房屋式样明显不同。震钧《天咫偶闻》卷十：“内城房式异于外城。外城式近南方，庭宇湫隘。内城则院落宽阔，屋宇高宏。”造成内城房屋高大的原因是：“内城诸宅，多明代勋戚之旧。而本朝世家大族，又互相仿效，所以屋宇日华。”内城的丧葬习俗也很有特点。得硕亭《草珠一串》诗云：“丧事时兴作细棚，灵前无物不求精。与其易也宁哀戚，说尽千年以后情。”①办丧事摆谱儿，铺张浪费正是王公显宦和旗人的惯习，“搭细棚”、祭品求精就是这种惯习的表现，而且旗人向有“办事儿”搭棚之俗，不仅办丧事，办喜事、祭祖都要搭棚。内城还有并无儿女婚事，却办所谓“出阁完姻筵席”的风俗。《草珠一串》诗云：“出阁完姻筵席开，梅红帖子印将来。并无儿女缘何故，撒网虚名又一回。”②何谓撒网？前因居士《日下新讴》说：“京师习尚拉拢，无论婚丧等事，先备请帖多许，因亲及友，辗转相邀，虽素无一面者，帖至亦必具送分金，谓之撒网。”③可见，办“出阁完姻筵席”是为了“撒网”，而“撒网”之习又正以王公贵族和旗人最突出。

内城社会生活习俗大量地表现为旗俗。这是因为旗人是内城主要居民的缘故。旗人入关以后，在许多方面逐渐汉化，满汉风俗也逐渐互相融合，但在北京，由于多数旗人相对独立地生活在内城，因而也就较多地保留了旗俗。例如，泡茶馆的风气在清代北京很盛，而此风气长期主要盛于内城旗人中。《草珠一串》诗云：“小帽长衫著体新，纷纷街巷步芳尘。闲来三五茶坊坐，半是曾登仕版人。”注云：“内城旗员，于差使完后，便易便服，约朋友茶馆闲谈，此风由来久矣。”④旗人泡茶馆，因其有钱粮可食，清闲无事，故形成了这一特定风习。汉人虽也有泡茶馆者，但成风气尚属晚近之事，并非“由来久矣”。内城旗人还有自己的食俗和常去聚食的饭馆。枝巢子《旧京琐记》卷九载：“城内缸瓦市有沙锅居者，专市豚肉，肆中棹椅皆白木洗涤，甚洁，旗下人喜食于此。”

即使在满族通用汉语的清末，内外城在语言习惯上仍有某些不同。金梁《光宣小记》将他在应试借宿内城时，听到的报史呼喊“为满文数目音”一事，作为新鲜事记录下来，就说

明内城在好用满语词汇这点上与外城不同。即使都操汉语，内外城也有“微异”。孙宝瑄说：“余生长燕京，所操语皆京语也。然与内城旗籍人语微异。⑤”

某些文娱活动，是内城流行或擅长而外城难匹的。子弟书即内城八旗子弟所创，并主要流行于内城。《天咫偶闻》卷七：“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创于八旗子弟，其词雅训，其声和缓，有东城调、西城调之分。西城调尤缓而低，一韵萦纡良久。此等艺内城士夫多擅场，而瞽人其次也。”正因为“内城士夫多擅场”，才形成了东城、西城两个流派。同书卷七又载：嘉庆以后，京师士夫盛行高腔，“内城尤尚之，谓之‘得胜歌’。相传国初出征，得胜归来，军士于马上歌之，以代凯歌”。高腔是清初八旗骑兵的凯歌。八角鼓是内城流行的一种曲艺项目。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由于内城禁戏园，故只能演些杂耍、八角鼓、曲词之类。八角鼓为八旗子弟所创，内城既限制演戏，八角鼓也就成了内城重要的娱乐项目。

再说外城。外城社会生活习俗中最突出者为“宣南士俗”，即居于宣武门之南的汉族中下层京官和各省在京士人所持有的一些习俗。由于旗民分城居住，宣南建起了大批汉官住宅和举子会馆。外省籍人自称为“宣南流寓”、“宣南寓客”。这些宣南士宦居住相近，交际频繁，习尚相同，自成一个生活圈子，因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宣南士俗”。

宅门上贴“封条”。《草珠一串》诗云：“封条处处禁喧哗，小小门楼也宦家。为问何人曾入仕？舍亲始祖作官衔。”⑥其具体情形，褚维垲《燕京杂詠》有云：“官居流寓仕京朝，门示头衔壁上标。待得春秋亲校士，红笺添亚两封条。”注云：“官宅禁示闲人，其乡会主试分校者，红条书某年某省主试，顺天乡试同考官，贴大门以示荣。”⑦这是说，宣南一带官宅上都贴着写有官衔的字条，为的是炫耀门第，摆官谱儿，禁人喧哗，也为了来客易于辨识。

宣南士大夫有许多共同的好尚、情趣，交际上时相过从，不拘礼节，行止也大致相同。杨寿枬《觉花寮杂记》载：京朝官“所居皆在宣武城南，衡宇相望，曹务多暇，互相过从，流连觞咏，斟酌图史，或僧寺看花，或旗亭赌酒”。其具体情形，如戴璐《藤阴杂记》卷九记邵青门《与阮亭尚书书自序》云：“忆已未客都门，寓保安寺街，与阮亭先生衡宇相对，愚山先生相距数十武，陆冰修仅隔一墙，偶一相思，率尔造访，都不作宾主礼。”可知他们交际频繁，不拘礼节的情况。又如“雅游”、聚会，大都集中在陶然亭、刺梅园、松筠庵、崇效寺、龙泉寺、龙树寺、长椿寺、云山别墅、畿辅先贤祠等处。陶然亭乃宣南士人游览第一胜地，凡寓居宣南者，无人不涉足于此。刺梅园也为雅游胜地。《藤阴杂记》卷十：“城南刺梅园，士大夫休沐余暇，往往携壶榼，班坐古松树下，觞咏间作。”宣南士人文集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保留了大量宣南纪游诗文。

逛琉璃厂书肆更是宣南士大夫的嗜好。厂肆的形成和发展就与此有密切关系，张涵锐《琉璃厂沿革考》说，厂肆发展于四库开馆时，“当时参与工作者多系翰詹中人，且多寓居宣南，而琉璃厂地点适中，与文人所居密迩，又小有林泉，可供游赏，故为文人学士所常至，书市乃应其需要而设”⑧。“逛厂”的岁时风俗，即正月上旬城郊文人墨客频繁地游逛琉璃厂，就是以宣南士人为主，并在其推动下形成的。

小酌广和居酒肆，是宣南士宦的普遍嗜好。《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说：“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路东，历史最悠久，盖自道光中即有此馆，专为宣南士大夫设也。其肴品以南炒腰花、江豆腐、潘氏清蒸鱼、四川辣鱼粉皮、清蒸干贝等，脍炙众口。故其地虽湫隘，屋宇甚

低，而食客驱之若鹜焉。”夏闰枝《广和居感旧》诗注云：广和居“市侩热客所不至，惟文人乐就之，朝贵耽风雅者，亦时莅之”。可见，广和居主要是宣南士宦官的饮酌聚食之所，内城权贵不大涉足。宣南士宦喜酌广和居，原因有二：一则这里饭食精洁，且“肴馔皆南味”，极合大批南方士宦的口味；二则这里远避尘嚣，士人争赴，颇具风雅之趣，实际成了一处宣南士大夫聚会觞咏的交际场所。这与内城旗人多赴沙锅居形成了对照，从这一生活与交际的细节上，也反映出内外城风俗的差别。

清廷对内城的某些禁令也促成了外城的一些习俗。按照旗民分居制度和“内城禁喧嚣”的规定，会馆都建于外城，并形成一片片会馆区，这就使外城出现了独具特色的“会馆风俗”。在工商会馆，工商业者集会酬酢，祭祀行神，观赏行戏；在举子会馆，士子们诗酒酬唱，祭祀先贤、演戏团拜。同乡会馆还有关照同乡的措施和埋葬同乡尸骨的义园。这些会馆风俗，包括了商俗、士俗、祭俗、葬俗、交际俗等各方面，大都是内城风俗中所没有的。又如清廷关于内城禁止开设戏馆的禁令和限制旗人、一般官员及太监赴园看戏的某些规定，⑨使外城演戏活动大为兴盛起来。《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云：“戏园，当年内城禁止，惟正阳门外最盛。”会馆里设置戏台并盛演堂会戏，这是内城没有的戏俗，这种戏俗的产生，与限制官员赴戏园看戏有直接关系。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记道：“在省的会馆中规模大的有戏台，规模最大的如虎坊桥的湖广会馆，三面有楼，和大栅栏的广德楼差不多。小一些的如越中先贤祠、江西会馆、全蜀会馆。”⑩其中越中先贤祠（又称浙绍乡祠，绍兴府会馆）的戏台经常借给人演堂会戏，林则徐日记嘉庆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记云：“（福建）同乡公请郑松如、杨古心两太守，在浙绍乡祠演剧，赴之。”内城演戏的情况则与外城明显不同，由于清廷的禁令，内城在公共场合的演戏活动很少；而王公高爵看戏，则不去戏园，他们自有府内戏班。这种贵族式的豪奢“戏俗”，外城是没有的。

清廷还禁止内城设娼。这使外城在珠市口以北，前门到和平门之间形成了妓馆区，狎妓之风也主要盛于外城。晚清以后，内城的妓馆逐渐多起来了。《天咫偶闻》卷五记明清北京妓馆的变化说：“明代勾阑，皆在东城，故有勾阑本司之名。至本朝裁教坊，其地尽改民居。即迤南之泡子河一带，所谓昔之歌舞场者，亦不可问。而正阳门外以西，则改为花柳之窟矣。未几，西四牌楼左近，复变歌吹之林。始只砖塔胡同寥寥数家，继则方以类聚，日变逾多。”

造成内外城社会生活习俗差异的原因，除上面提到的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及清廷的一些禁令外，还有市政管理方面的原因。在管理上，内外城各自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城，“管理地面之官”也有不同，徐珂《清稗类钞》说：“京城管理地面之官不一。曰步军统领，司内城盗贼也；曰外营汛，司外城盗贼也。”⑪内城的管理更受到清廷的重视，措施更严格，外城则相对地松弛些。在交通上，内外城被一道高高的城墙阻隔，交通要道只有正阳、宣武、崇文三个城门，而且实行了严格的城禁制度，即如雷震《新燕语》所说：“都中昔日，城禁綦严，向夕即闭，各官除清之宗室亲贵外，皆居外城，每夕三更后，惟正阳门启一次，以备各官入朝，而内城之偶留于外者，即乘此时随入，俗谓之‘赶夜城’，但许入而不许出，防宵遁也。”⑫以上就是清代北京内外城社会生活习俗的不同特点，研究、考察这些特点，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清政府在北京城所实行的一系列统治政策，及其对北京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

---

①②④⑥《清代北京竹枝词》53页，5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

（下转第56页）

《清代碑传全集》年内出版

稼　禾

中国从清代开始步入近代，走向世界。

清代二百八十六年间，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和传统文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涌现出一大批与往昔迥异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思想家、科学家与文学艺术家，他们丰富多采的活动是清代纷繁复杂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对清代（包括近代）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学术界和读书界迫切需要一部资料详尽的清代人物传记的总集，为此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清代碑传全集》。

《清代碑传全集》是根据钱仪吉《碑传集》、缪荃孙《续碑传集》、闵尔昌《碑传集补》和汪兆镛《碑传集三编》编纂而成，共记载有清一代各类人物五千五百余人，分功臣、宰辅、部院大臣、内阁九卿、督抚、儒林、文苑、畸人、艺术、方术等二十余种类别编排，总字数达六百余万。

《清代碑传全集》取材自传记、碑记、谱牒、图录、文集、方志等资料四百余种，其文体有传、墓志铭、神道碑、行状、逸事、序跋等类，使同一人物既有史臣史家编写的传记，又有文人学士所撰的碑状，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传主的一生。其资料收罗详尽，有的今已难求，颇为珍贵；其碑传史文并茂，叙事写人，翔实生动，凡此都使本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是清代文史研究者案头必备的重要参考书。

《清代碑传全集》以拼缩方法影印，十六开精装二大册。书末附有全书五千五百余人的姓名字号室名索引，无论是以姓名求字号室名，还是以字号室名求姓名，均一索即得，极为方便。本书定价约四十元左右，一九八七年年内出书。

（上接第27页）

③载《文献》第十二辑190页

⑤《忘山庐日记》588页

⑦《北京风俗杂詠》5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

⑧《璃璃厂小志》4页

⑨《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第12册1～3页

⑩《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册222页

⑪《清稗类钞·爵秩类》，第十册9页

⑫《北平风俗类征·市肆·赶城》